

唐宋文学 与文献丛稿 (上)

尹占华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作者简介

尹占华，河北省故城县人，一九四七年生。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九八五年于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并取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曾任《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唐文学部三（中唐部）的副主编。出版的著作有《张祜诗集校注》、《王建诗集校注》、《律赋论稿》、《诗词曲格律学》、《柳宗元集校注》等。



唐宋文学 与文献丛稿 (上)

尹占华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唐宋文学与文献丛稿 / 尹占华著. —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528-0209-2

I. ①唐… II. ①尹…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宋时期—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4211号

唐宋文学与文献丛稿

尹占华/著

出版人/张玮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42.75 字数 830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209-2

定 价：108.00 元（上、下册）

自序

我自1985年1月在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便一直留校工作,自然是当教师。教过的课程有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本来也就想做个教书匠,有个饭碗可捧,能传道、授业、解惑便可,学问可不必皆由己出。在教书的过程中,对一些问题也有自己的想法,于是把它们记下来,陆续写成了文章。后来又参加过一些编纂的项目,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华大典》。我所参与的是《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中的中唐部分,又有幸担任这一部分的副主编,故自己不仅到处翻书并抄录有100万字资料(印成书时删减成50万字),还订补了中唐部分的全部文稿。这一工作使我对中唐的文学文献摸了个底,自然也发现了不少的问题。后来也陆续写成一些文章。教学之余也去思考一些问题;这样一“挤”,也使自己努力试图寻出适当的答案。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字,约有半数是“无为而为”的,半数是有“有为而为”的。至于给这个集子起个什么名字,挖空心思也没想出个什么好词,姑且就名之曰“唐宋文学与文献丛稿”吧,虽然有些名不副实。

因为文字的性质不同,我将它们分为“评论编”和“考证编”两部分。编在“评论编”中的文章都是评论性质的,有关于唐诗、宋诗和宋词的,也有几篇是关于赋的。所论唐宋诗词,也大多是在文学史上不立专章甚或根本没有提及的一些作家或文学流派。评论性质的文章是讲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的,自己也力求客观和实事求是,然而是否达到了较高水平则不敢妄言。评论作家或文学作品,都免不了带有个人主观因素,见仁见智,也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这些文字,也就是谈谈自己的看法,或许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编在“考证编”中的文字则属于考证之类,如关于作家的行踪、作品的归属或系年、文字的解读等。这些颇有琐碎之嫌,可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没有什么大道理。这些东西大多都是读书时的心得,每当发现这样的问题,通过文献的东翻西找、搜寻拼凑,而得到一个比较符合情理的解答时,反倒时有得意之感。这大概就是读书的一点乐趣吧。所以不管发表过还是没有发表过,大都没舍得丢弃,也一并收了进来。至于所给出的解释是否成立,能否为研究者所信服,则另当别论,留待读者评论吧。

写学术文章是很累的,对于像我这样愚钝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大多数问题思考了很长时间才能下笔,很多问题甚至思考了很长时间也不能下笔,因为仍然理不出头绪。我是吃中国古代文学这碗饭的,写这样的专业文章也有好处,就是不涉现实,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荀子》曰:“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是说论事有理有据,即可服人。我想收在这里的文字,苟不足以服人,尚可备一家之

说吧。

我也做过几个唐代作家文集的注释工作,计有张祜、王建、柳宗元。张祜的做得最早,那时基础薄弱,知少识浅,竟不自量力要注解古人的集子。做注释,古人的每一个字都是不能轻易放过的,碰到障碍绕过走,那是不行的,所以其中错误之多就可想而知了。后来重版了一回,才算把发现的错误纠正了过来。再做王建的就小心多了,但仍然有虑所不及、百密一疏之处,还是留下若干遗憾。如卷八《田侍中宴席》“彩凤斜飞入五弦”,注“彩凤”为“舞者”便错,此“彩凤”为乐曲名。卷九《新晴》“檐前著熟衣裳坐”,校“著熟”为“熟著”,并解“熟著”为“穿好衣裳”亦错。“熟衣”为“生衣”之对称,以未经漂煮的丝麻做成的衣裳称生衣,穿着比较凉爽,经过漂煮的丝麻做成的则称熟衣。白居易《西风》:“新霁乘轻履,初凉换熟衣。”《感秋咏意》:“炎凉迁次速如飞,又脱生衣着熟衣。”如上述见笑于大方之家处尚有,可见准确注诗之难。曾听人说:你如果做得十全十美了,别人还有什么可做的?意思是说学问不可能做得尽善尽美,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不能成为粗疏的借口。

我于2012年8月份退休,退休之后,想把过去写的文章整理一下,也算是对自己、对工作的交待。我对自己原来发表过的文章有些并不满意,这次将它们集中起来,正好有机会做一做修改补充的工作。反正也不想保持原貌以“立此存照”,既然发现了不足或纰漏之处,为何不做一些补缀的工作?所以收在这里的文章,和原来发表时相比,有的或多或少做了些修改,甚或改动很大。若是受了他人文章的启发,已在附记中注明。这也应了学人们的话:做学问没有止境。我也有同感,虽然自己觉得累,但还是愿意继续做下去。

上面的话就算此次编集的序言吧。

尹占华

2012年12月于兰州西北师大寓所

目 录

评论编

唐代文人社会地位的变迁与文学的发展	(3)
唐边塞诗综论	(11)
大历浙东和湖州文人集团的形成和诗歌创作	(19)
评睦州诗派	(29)
唐人的律诗观	(39)
论打油诗	(47)
论李白的侠意识	(59)
杜甫七律中对仗的创新性	(66)
论韩愈诗的喜剧精神	(72)
论卢仝诗的题材取向与艺术风格	(84)
李贺诗歌的创作心态	(97)
论王建的诗	(104)
“五寔”及其诗论略	(119)
论郊岛与姚贾	(127)
论张祜的诗	(137)
张祜叙论	(148)
“诗人言不必有实” ——李商隐爱情诗新探	(155)
宋人论作诗合“理”与宋诗	(163)
论九僧诗 ——兼论五言律诗在宋代的衰落	(172)
论苏轼人生的悲剧意义	(184)
谐谑戏笑话苏轼	(192)
论张耒的诗	(198)
论秦观的诗	(211)
辨张元事兼论张元姚嗣宗诗	(224)
论宋词的分期	(230)
柳永周邦彦姜夔三家词的比较	(239)
姜夔词的距离感	(252)

论周密等人西湖词社的创作活动	(260)
非文学赋概论	(273)
论赋的文体特征的无规范性以及唐赋形式的两极分化	(283)
白居易制诰文中的“新体”与“旧体”之辩	(291)
论苏轼的四六文	(296)
宋代日记文述评	(304)

考证编

《唐国史补》中的一段人物品评考	(329)
《登科记考补正》之再补正	(338)
纥干姓氏考及唐代的纥干姓人物	(349)
袁同直事迹与唐时蕃汉融合	(354)
陆羽佚文佚著考	(360)
陈翊陈雄陈翊与陈诩考	(368)
关于令狐楚的两篇考证	(374)
《莺莺传》是元稹自寓 ——兼与吴伟斌先生商榷	(381)
关于李益“五在兵间”的问题	(388)
柳宗元博学宏词登第及游邠宁的时间考	(393)
《幸南容墓志铭》非柳宗元所作	(397)
《龙城录》是柳宗元所作	(402)
唐有两施肩吾考	(406)
胡钉铍考	(411)
《东城老父传》为陈鸿作	(416)
苏特及其《唐代衣冠盛事》	(420)
唐人杂考上	(424)
宋之问《灵隐寺》诗作于台州	(424)
再谈孟浩然《寄正字》	(426)
“山东李白”还是“东山李白”	(427)
再读李季卿《三坟记》并考李子卿事迹	(429)
两崔损	(431)
乔潭进士及第及《裴将军剑舞赋》的作年	(433)
徐凝诗有四首为徐巖所作	(433)
戴少平与还魂事	(436)
刘皂	(437)
李赤与《姑熟十咏》	(439)

牛僧孺的家世	(441)
“司空见惯”一诗为刘禹锡在牛僧孺席上作	(444)
小蛮不是白居易家妓	(447)
哥舒恒哥舒岷是一人	(448)
唐人杂考下	(450)
两杜信	(450)
辛丘度事迹	(451)
造怪字以问王起为唐文宗事	(452)
贾岛与唐宣宗事不诬	(453)
两张祜	(455)
李廓事迹与卒年	(457)
李商隐诗中的错简	(459)
两李频	(459)
房千里其人及其著作	(460)
山玄卿之文为伪托	(464)
许筹《嵩岳珪禅师影堂记》之“及进士第一年尉告成”	(466)
刘异事迹	(467)
《卓异记》作者考	(468)
王翊王雄王翊王诩王宏是一人	(471)
陈章即陈璋	(472)
王建系年考	(473)
姚合系年考	(501)
张祜系年考	(531)
唐人酒席间的歌舞与酒令	(549)
唐参军戏补说	(559)
《穆护砂》与《牧护歌》非一曲	(566)
梁祝故事起源与流传的再考察	(570)
《醉翁琴趣外篇》的再审议	(577)
陆游《钗头凤》词本事再辨	(582)
“屁”话	(586)
说“酱菜”与“装蒜”	(590)
《伍子胥变文》伍子胥与其妻对话中的药名与语意	(592)
附录：	
唐人十一种医方文献辑佚	(597)
王方庆《岭南方》	(599)
杨炎《南行方》	(600)

唐德宗李适《贞元广利方》..... (602)

李绛《兵部手集方》..... (609)

崔玄亮《海上集验方》..... (616)

刘禹锡《传信方》..... (624)

杨归厚《杨氏产乳集验方》..... (633)

韦宙《独行方》..... (641)

王绍颜《续传信方》..... (644)

姚和众方 (648)

梅崇献方 (652)

评论编

唐代文人社会地位的变迁与文学的发展

唐代,由于科举制度的实行,大量出身于中下层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预政权管理,从而形成文人士大夫这一特殊的阶层。这种变化必然从唐代文学中反映出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创作是作家社会地位的一种折光。以唐代文人作家队伍主体之社会地位的变迁为脉络,唐代文学仍然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初唐是文人承袭作为皇帝或王室的文学侍从的时期;盛唐是他们开始摆脱文学侍从的依附关系、积极以文从政的时期;中唐是文人广泛从政、开始士大夫化的时期;晚唐则是文人们理想破灭的时期。从文人作家社会地位变迁的角度来考察唐代文学的发展,也许能说明一些不易说明的问题。试分述之。

一

南朝文人作为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而存在,《南史·文学传序》说:“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他们的文学创作自然要投合主人的需要。《南史·陈后主纪》载:“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这种文学自然是淫靡的,所以南北一经统一,便遭到有识之士的抵制。隋文帝朝,文风改革的呼声甚嚣一时,但却随着炀帝的即位而烟消云散。推其原因,则如《隋书·柳晋传》所云:“王(晋王杨广)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珽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晋为之冠。”情况与南朝毫无二致。唐代文学是从反对绮艳开始的,如王通鼓吹:“学贯道”、“文贯义”(《中说·天地》);魏徵也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的作品为“亡国之音”(《隋书·文学传序》),但收效不大。唐初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一方面仍是“承隋、陈风流,浮靡相矜”(《新唐书·杜甫传赞》)。产生这种现象,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文人同样没有摆脱文学侍从的身份,上官仪、沈、宋、“文章四友”即其代表。唐太宗本人的态度颇能说明问题,他害怕亡国的危险,当从政权的存亡着眼时,反对南朝文风;但当安居宴乐时,又从感情上接受这种文学。所以他不退《玉树》、《伴侣》之曲,自己也作宫体诗,还要虞世南赓和。唐太宗未曾放弃过以文学为弄臣的传统观念,他赞赏上官仪的诗“以绮错婉媚为本”,又好大喜功,屡屡让臣下奉和,歌功颂德之声不厌于耳,连魏徵也写了不少这类应制的作品。律诗的兴起正适应了统治者的这种需要。武则天也延揽一大批文学之士在自己周围,作为歌舞升平的点缀,沈、宋便是这样的宫廷诗人。宋之问赋诗



夺袍,沈佺期舞《回波乐》,文人地位如同俳優,于此可见。沈、宋又都谄附张昌宗、张易之,李峤、崔融、杜审言也都作过二张的门客;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也曾分别依附过沛王、邓王、道王。这类事较多出现在初唐,说明初唐文人仍然处于文学侍从的地位。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文学活动具有为他人而作的特点,既非言志,也非缘情,而是作为一种任务,一种为他人服务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文学作品自然具有摆设、装饰的特点,其风格绮艳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初唐文风绮艳而不放荡,教化说也正在暗中兴起,并有取代娱乐说之势,因为初唐文人已经开始不满足于这种文学侍从的地位了。王勃批评当时风气:“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上吏部裴侍郎启》);杨炯批评文学承继南朝遗风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故而“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王子安集序》)。他们对南朝文风的不满,实际上也是对文人侍从地位的不满,他们的兴趣已从趋奉官府转向立功边塞了。这种志向的产生也是十分自然的,唐太宗戎马半生,终于君临天下,这事实本身就是对建功立业精神的提倡。武则天大批擢用庶族,更是在现实秩序中打破了门阀世胄对权力的垄断,必然在中下层文人心中激起强烈的反响。杨炯声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骆宾王、崔融、陈子昂等皆有实际从军经历。骆宾王后来参加徐敬业的起兵反对武则天,多少也有建功立业的思想在起作用。陈子昂对于新诗风倡导最力,标举“风骨”,主张“兴寄”。所谓“兴寄”,就是要求作品寄托功名志向等重大政治思想内容。所以陈子昂文学主张的核心乃是树立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是对于积极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的要求。《感遇诗》三十八首中颇有议论时政之作,便是这一要求的体现。但是在陈子昂的时代,这种要求尚不现实。唐太宗、武则天虽然各自打击了一批旧的门阀士族,但同时又形成了一批新的门阀士族,朝政仍然把持在这些人手里,中下层文人参与政权管理谈何容易!陈子昂就因得罪武氏集团,被武三思指使县令段简将其害死,一生是悲剧性的。《登幽州台歌》表现了陈子昂满腔的郁愤和强烈的孤独感,是一个先驱者的悲哀。如果说《登幽州台歌》是对未来的远眺和期待,那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已是未来那充满梦幻的奇异境界了,人生展望中所感到的一种莫名的惆怅和淡淡的哀愁,是对未来无法预知的迷惘。总之,初唐作品无疑已在预示着文学的一个更为辉煌时代的到来,而文学从宫廷王府中走出来的重要契机则是文人作家已不甘心于文学侍从的地位。

二

盛唐的绝大多数文人作家都积极试图以文从政,因而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充满了理想主义的颂歌,其基本特征便是歌咏功名抱负和抒写人生意气。广大文人对政治功利抱有极大的热情,只是所走的具体道路不同。有的通过从军出塞博取功名富贵,有的则以隐逸的方式待价而沽。但对大多数文人来说,现

实并未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的雄心壮志多存在于理想之中。孟浩然、李白、李颀、王之涣、王翰、王昌龄、崔颢、祖咏、杜甫等众多的文人,或布衣终身,或屈居下僚,一生都不得志。李白自视甚高,以天下为己任,想平步青云,可惜不能如愿。孟浩然隐居求仕,结果也是“不才明主弃”(《岁暮归南山》)。王维先是混迹于官场,似乎如愿了,后来因受安禄山伪职而遭挫折,遂亦官亦隐,奉佛求静,仍是政治舞台上的失败者。储光羲的经历和王维有些类似。那些踏上从军出塞之路的人,情况大致要好些。岑参官至刺史;高适拜散骑常侍,《旧唐书·高适传》说“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可见他是个例外。这种情况决定了盛唐诗歌一方面是对功名事业的向往,是理想的讴歌,一方面又是壮志未伸的牢骚与愤慨。“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多么豪迈!“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又多么凄伤!这是多么深刻的矛盾!如果说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是刚踏上新的人生征途的文人那种未谙世事的天真,那么杜甫“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已是历尽坎坷之后沉痛的感叹了。正是想从政而未能如愿这个深刻的矛盾,才决定了盛唐诗歌慷慨而又忧愁的双重特色。有人把盛唐之音单纯理解为一种英勇豪迈、乐观向上的风格,其实是不全面的。

盛唐文人基本上摆脱了文学侍从的地位,但是在最高统治者的眼中,文人形象与初唐并无多大改变。唐玄宗对李白的态度可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赏识李白的诗名,把诗人召到长安,“降辇步迎,如见绮皓”(李阳冰《草堂集序》),也无非是把李白当作宫廷帮闲,“赏名花,对妃子”,李白作诗,李龟年唱曲,成为他风流天子享乐生活的一部分。力求从文学侍从之臣的地位中解脱出来的唐代文人,视获取某种政治权力为唯一出路,先不说做官仍然是依附皇权,就是在争取一官半职的过程中,也必须一再降低自己的身份。王维出入岐王、宁王府第,李白也走玉真公主的门路;杜甫为求得官职,一再不择对象地向达官贵人献诗求荐,并直接向皇帝献赋希宠,真是“苦摇求食尾,常暴报恩腮”(《秋日荆南书怀》)。再如边塞诗人高适、岑参,他们作为握重兵于一方的节度使的幕僚,从事一些文字工作如章表书信等,和幕主的关系虽然不是主仆关系,但对幕主总是仰仗和有所希求的,幕主的提携、推荐往往是他们得以出人头地的关键,自然也带有某种依附的痕迹,所以奉承之作便不在少数。杜甫于至德二载(757)唐军收复长安后,随同皇帝回到京师,便完全忘记了身处乱世之中,和贾至、王维等酬唱答赠、歌咏升平,又回到了文学侍从的地位。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如果说在皇帝的眼中文人仍然如同俳優,那么实际上却不能当俳優对待了。王维受安禄山伪职,李白从永王李璘,按律是大罪不赦的,却都得到了宽大对待,这不能不说得救于他们的诗名。朝廷对于杀一个大诗人终究是有些顾忌的。

正因为盛唐文人想从政而未得,才使他们保持着一定的人格独立。文人处于侍从地位时,要看主人的脸色行事,没有什么独立的人格可言。盛唐文人



不是这样,李白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是他们摆脱依附之后的开心乐事。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以及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等传说故事,正反映了那个时代初露头角的文人情感、愿望和要求。他们希望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能自由自在地享受人生的欢乐。盛唐时代对于文人成为政治家的命运来说,是不幸的;对于他们作为文学家的命运来说,是幸运的。李白正是由于终生未得一职,才得以任情适性,在诗酒之乐享受中度过他傲岸不羁的一生。杜甫也是由于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饱尝了人世的辛酸,于是把视线转向社会上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因而写出了那个战乱时代一系列真切感人、波澜壮阔的诗篇。需要指出的是,杜甫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并非如后来元白所鼓吹的是出于一种明确的政治目的,恰恰相反,而是出于一种心灵的感受,是对现实的忠正,他不能不说、不能不写,这也是杜甫的现实主义诗作绝对高出元白出于功利主义的政治目的而创作的新乐府诗的根本原因。即使如王维,虽未离官场,而心却皈依佛教,观空乐静,同样是一颗净化的心灵,是一种人格的完成。

三

唐太宗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科举制度终于逐渐完备起来了,遂使大量文人通过科举渗入统治阶层。“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到了中唐,为官者甚至耻于不由科举入仕。正是科举,为文人知识分子介入政权管理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也是科举,使大量文人进入社会上层,促成了文人的士大夫化。他们思想上依傍儒家经典,政治上委身皇权,从而也失去了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和根据内心准则自由行事的特点。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减少了理想与热情的成分,增多了现实的观察与理智的思考。正是这种情况促使文学至中唐为一变。

其实这种变化大历时期已经开始了。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文人靠自我奋斗以求出路,不少人在幕府中当过僚佐,还有的人取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做过州刺史的便有元结、韦应物、李嘉祐、刘长卿、戎昱、戴叔伦。总的来看,他们的政治地位已非盛唐文人可比,但作品却失去了盛唐时期的骨力和气势。元结出于“忧黎元”之心,要求文学作品“救时劝俗”(《文编序》),“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是韩愈、白居易功利主义文学理论的先驱。皎然《诗式》则推崇高逸,把风韵、闲放看作诗歌创作的典范,反映了另一群政治失意的文人们的审美情趣。大历时期是盛唐向中唐的过渡,因而具有双重特色。

中唐是文人广泛从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大量文人作家既是文学家,又是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如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元稹、白居易、李绅、李翱、姚合等。一些地位较低的文人作家则聚集在地位较高者的周围,因而形成了一

些趣味相投的文人群体。作为文人从政的一个显著的标志便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主张的大肆鼓吹与倡导。韩愈是古文家,又极热衷于功名利禄,鼓吹文道合一,以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自居。于文学方面韩愈强调“道”,具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性质;于政治方面他又强调“文”,借以抬高文人的地位。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韩愈看到佛教的流行对于封建政权的腐蚀作用,于是打出道统的旗号反佛;看到藩镇割据对于中央政权的危害,又大倡君臣之道以图巩固皇权,所以他的文学主张明显地具有政治功利的色彩。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同样贯穿着一条为政治服务的主线。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他的《秦中吟》与《新乐府》也确实实践了上述主张,先作《秦中吟》,“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见而悦之,召入翰林为学士”(《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又作《新乐府》五十首,“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以期达到“易谕”、“深诫”、“传信”的目的。可见白氏是把诗歌看作向皇帝反映情况、进行谏诤的工具的。这一理论在中唐被大力提倡,而且形成一股潮流,正是文人走上政治舞台的必然结果。

文人担任要职自然意味着政治地位的提高,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即卷入政治斗争也必然使所冒的风险增大。刘禹锡、柳宗元随着永贞革新的失败而连遭贬逐,柳就此一蹶不振;韩愈也两次遭贬,第二次因谏迎佛骨触怒唐宪宗,险些送掉性命,所以他一到潮州便赶紧诚惶诚恐地上了一道谢表,说自己“狂妄戇愚,不识礼度”(《潮州刺史谢上表》)。白居易为谏官时,敢于当着皇帝面说“陛下错”,宪宗老大不高兴,说他“小臣不逊”(见《资治通鉴》卷二三八)。白居易事后回想起来心有馀悸,说是“志未就而悔已生”(《与元九书》);“曾犯龙鳞容不死,欲骑鹤背觅长生”(《月》)。故在屡遭挫折之后,这位“唯歌生民病”的新乐府诗人,也就逐渐变成一个“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从同州刺史改换太子少傅分司》)的“中隐”了。封建统治者一方面要起用文人,一方面又要防止文人给他捣乱,防止的办法莫过于以文治罪。一方面诱之以利,以致很少有人能在高官厚禄的诱惑面前无动于衷;一方面胁之以威,使其行为乃至思想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封建统治者这两手是逐渐完善起来的。中唐处于文人从政之始,但已肇文祸之端了。刘禹锡元和十年(815)自朗州被召至京师,因作《戏赠看花诸君子》,“诗语讥忿”,触怒当权者,于是又被贬逐。白居易元和十五年(820)上书言事,为执政者所恶,遂说白母因看花堕井而死,白作《赏花》及《新井》诗,有伤孝道,贬江州司马。王建作《宫词》,多言禁掖中事,险遭弹劾。上述皆是以文字惹祸之事。韩愈作《毛颖传》,写毛颖(笔)于秦有功,老而见疏,责秦“少恩”,是一幅绝妙的文人自画像。文人在从政之后,大概也感到了统治者对自己的利用,所以对政治既热衷又害怕,既关心又不感兴趣。他们的文学思想无不具有两重色彩。如白居易论诗,既主“美刺惩劝”,又说“释恨佐欢”;韩愈论文,既要载道,又说“不平则鸣”,后者便不是载道而是缘情了。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是中唐诗歌走向退缩和萧瑟的重要原因。